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二十九辑)

总主编/李小明

三晋纵横家

高专诚

著



三晋纵横家是战国时代纵横家的主体,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研究三晋纵横家,对全面而深刻了解战国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观念发展,对三晋国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以及三晋文化在中国思想史的作用和影响,有着深远的意义。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冬梅

郭红娟

复审：张静华

终审：严果生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29辑)

三晋纵横家

高专诚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75 字数:300千字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978-7-900454-16-4
G·131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璧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杨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钟声扬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士星
郭双威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一、纵横家与三晋“权变之士” (1)

二、苏秦与苏氏三兄弟 (12)

三、张仪与公孙衍 (31)

四、纵横家与《战国策》 (38)

五、三晋纵横家的历史影响 (43)

引 子

战国时代的“纵横家”是当时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现象,而三晋纵横家则是战国纵横家的主体,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之所以说纵横家是当时的一个特殊现象,是因为这种现象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其他发展阶段再没有出现过。之所以说纵横家的行为是一种政治、社会和文化现象,是说纵横家的行为及其后果不仅影响着当时的现实政治走向,而且对于当时的社会风俗、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三晋纵横家之所以成为纵横家的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主体,一是因为主要的纵横家人物出自三晋地区,他们的成就使纵横家的影响力达到颠峰时期;二是因为合纵与连横的兴衰成败,也主要决定于三晋政治的走向。所以,研究三晋纵横家,对于全面而深刻地了解战国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观念的发展,对于三晋国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以及三晋文化在中国思想史的作用和影响,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纵横家与三晋“权变之士”

(一) 纵横家并非外交官

根据东汉史学家班固在其《汉书·艺文志》中的说法,

“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说的是纵横家之类的人物，其起源可以追溯至“行人”这种官职。所谓“行人”，就是先秦时代的外交官，他们是随着西周分封诸侯之后而出现的一种官职和官员。周天子朝廷之上和各诸侯国中都有这样的官职，《周礼》对之也有明确的记载和说明，甚至还有“大行人”与“小行人”之类的区分。当然，《周礼》的说法一般比较理想化，很难找到一一的史籍和史实对应。不过，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史记·集解》引用服虔的解释是：“行人，掌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宾大客，受小客之币辞。”这是对于最初的“行人”职能的一种说明，即一国的“行人”在本国时主要是招待来自其他邦国的使者，同时也作为本国的使者出使他国。显然，“行人”之职，非常类似于现在的外交官。

当然，作为外交官，在邦国的多事之秋，作用更为显著。在先秦时代，“行人”的作用从春秋时代开始日渐突出，当时的典籍记载中也反映了这一点。比如说，在《论语》的记载中，当时的郑国就有“行人子羽”参与起草外交文件，“行人子羽”就是名叫子羽的外交官。孔子把君子的品格之一一定义为“可以寄百里之命”，就是说，身为君子，如果去担任外交使者，一定要完成国家交给的使命。孔子还说过：“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说，作为出使四方的外交家，一定要在各种外交场合很好地运用《诗》中诗句，做出恰当的应对，这在《左传》中有着很多生动的记载。当孔子看到那些出色的外交人物时，不禁

感叹：“使乎，使乎！”意思是说，这才是真正的使者啊！从一个侧面肯定了那些能够胜任其职的外交使者。

称为“行人”的外交官与主张合纵连横的纵横家的分野发生在战国前期，并且与秦国的政治走向息息相关。秦孝公以后，秦惠王和秦武王开始以雄厚的国力向东挺进，山东诸侯各国深感恐惧，不得不寻求对策，应对强秦。总的来说，对于秦国不外乎有三种策略。一是单独对抗，二是联合对抗，三是程度不同的服从，并且不断被秦国蚕食。在这个过程中，显然联合抗秦更为有效，这就是“合纵”之约。但是，由于各国均以本身利益为重，在合纵抗秦的过程中往往缺乏诚意，时合时离，客观就需要有人从中斡旋，而貌似“行人”的纵横家人物就应运而生了。当时，有名的“战国四君子”，即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他们本人既是有成就的外交家，同时也能做到宽厚爱人、尊贤重士，门下拥有一大批擅长“约从离衡”的人物，并且能够经常形成“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的局面。

不过，“战国四君子”式的外交活动，也使传统的外交使命逐渐变了味道，形成了独特的“纵横家文化”。一是在这样的外交活动中，国家的归属感慢慢变得不太强烈了；二是这样的外交活动通常只针对某个突发事件，无法形成连续性，不足以成为一个国家的主导外交政策。所以，当吴起出走魏国，在楚悼王的支持下主持楚国的变法活动时，就提出“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吴起之所以特别要

“破驰说之言从横者”，就是因为纵横家与外交官是有区别的，而这样的区别，对于理解三晋纵横家的表现和成就也是大有帮助的。

首先，被称为“行人”的外交官是一种官职，是由周天子和各国政府控制下一种政治职能，外交官是由政府任免的。而纵横家则是一种非官方的人士，是特殊时势下的自然产物，也是依据个人的才能和追求而形成的。

其次，外交官是有国籍和国界的，是讲忠诚的。也就是说，外交官要忠于一国的君主，为一国的利益尽职。而纵横家则没有这方面的压力，他们主要是为个人利益或个人的荣华富贵而尽力的，所以，他们的取舍和行为方式完全是个人利益或喜好的左右。

第三，外交官是有原则的。虽然必要的外交智慧是需要的，但在外交场合和外交对垒中，时时处处都有既定的原则，不能任由个人发挥，不能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或君主利益之上。而纵横家则以获取个人的成就为主，做事也没有一定之规，甚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第四，外交官是讲信用的。虽然缺乏信用在当时各国之间的外交活动中已经成风，但作为外交官，在外交活动中，是把自己的外交承诺视为一定要兑现的内容，只是有些承诺实在不是外交官个人或外交活动本身所能兑现的。但是，纵横家却从不把守信信用当回事，或者说在他们的心目中，守信用是根本没有被考虑过的。为了达到个人的最终目的，他们完全可以不考虑能否兑现给各国当政者在当初的承诺，或者此时承诺的东西彼时就会完全否认。

上述外交官与纵横家的区别,往往被后人所忽略,事实上,这样的区别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以苏秦和张仪为代表的三晋纵横家来说,这样的区别尤其重要。很多人片面强调苏、张二人的才能和成就,而对于他们纵横天下的负面影响,至多在诡诈论之。这样的评判,对于认识和理解三晋纵横家的思想和行为显然是不够的。

(二)合纵连横的时代

以“行人”为代表的先秦时期的外交活动,从春秋时代开始逐渐成为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方面,而从战国时期开始则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阶段。特别是战国中后期以后,秦国经过秦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国力日强,不甘心偏居于西方,逐渐有计划地向东发展,使山东六国面临着空前的战争威胁和生死存亡的考验。与此同时,“马陵之战”以后,齐国代替魏国成为中原地区最强有力的国家,也渐渐萌生了掌控天下的野心。至于南方的楚国,春秋时代以来就积极北上,当然也不能坐视秦、齐两国向中原地区的推进。而赵、魏、韩三晋国家处在东西南三强的夹击之下,即使不把一统天下放在首位,退而图谋自存,也不得不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和攻击。在此形势下,各国间出于种种目的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和重要,从而在客观上为纵横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战国纵横家简单地来说就是主张合纵的一派和主张连横的一派。《韩非子》在战国末期总结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这里的“纵”就是“合纵”,指弱国联合起来抵御和进攻强的外交策略,具体来

说,主要表现为齐、楚、燕、韩、赵、魏等山东六国联合起来应对秦国的东进。当然,这样的联合是多种多样的。或者六国联合对付秦国,或者几国联合起来对付齐国或楚国。“横”就是“连横”,是指某些弱国追随强国进攻其他弱国的外交策略,主要表现为山东六国中的某几国分别与秦国结盟而攻打其他国家。

关于“纵”与“横”的来历,也有其他说法。最常见的是,因为习惯上人们以南北为“纵”,东西为“横”,而正好六国地连南北,六国联盟对抗秦国就被称为“合纵”;而地处西方的秦国联合山东六国中的某一国,最典型是联合地处东方的齐国,形成东西联系,这样一来,六国中的某一国或某些国家与秦国的结盟就被称为“连横”。所以,那些对当时七国间的政治形势非常熟知,善于辞令和权术,敢于利用各国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从中获取功名利禄的说客就应时而生,史书上就称他们为“纵横家”。

在文献记载中,“纵、横”二字有多种说法。因为同音假借的缘故,“纵”一般用为“从”,“横”则多用为“衡”,所以,《史记》中就有“从人”、“合从”和“衡人”、“连衡”的说法,意指主张合纵和连横的人物,即纵横家。

对于纵横家的本质,或者他们的行为动机,《史记》有说法相当犀利。“从人多奋辞而少可信,说一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谈士莫不日夜扼腕瞋目切齿以言从之便,以说人主”。因为只要能够说服任何一位诸侯,就会被封侯,享尽荣华,所以,主张合纵的纵横家,时时刻刻都会绞尽脑汁地用花言巧语说服君主,并且不惜夸大其辞,宁肯其内

容缺乏可信度。这是说,“从人”主要是面对山东六国的君主。

同样,“夫衡人者,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予秦”,只要能够给秦国带来实际利益,主张连横的纵横家就能享受秦国提供的优渥的物质享受,至于他们的祖国是不是会因为他们而遭受秦国的祸患,则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因为有实际利益的诱惑,“是故夫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惕诸侯,以求割地”,“衡人”只想着用秦国的力量威胁诸侯,以求得各国诸侯给秦国割地。

很显然,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纵横家的表现正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信仰体系的破碎,以及个性的极度张扬。

早在春秋时代,由于社会的发展和各种利益关系的日趋复杂,各国间战争不断,诸侯与周天子之间失去了信任,诸侯之间失去了信任,相互间只好订立各种盟誓和条约,并请求各种神灵为这些盟誓和条约作保证。但是,面对实际利益,这样的盟誓和条约不断遭到抛弃和践踏,证明了人们对神灵的信仰是不起任何实际作用的。春秋末期以来,百家争鸣逐渐形成,各种不同的思想纷纷涌现,旧有的思想体系彻底被否定,对神灵的信仰也随之被动摇。信守旧的政治信仰、神教信仰和思想信仰,就意味着实际利益的受损,而新的各个方面的信仰体系尚未确立,这样一来,一个信仰危机甚至缺乏信仰的时代风气,就为纵横家的朝秦暮楚的行为、缺乏诚信的言辞,提供了最有力的思想基础。

到了战国时代,周天子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甚至连徒有其名的傀儡作用都难以发挥,而各诸侯国的力量达到了

空前的强大和相互平衡。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各样的人才成为各国争夺的主要政治资源。那些饱学之士,甚至是自恃有才者,频繁驰骋于各国之间,迫使各国当政者对这些人才敬畏有加。这就为士人们张扬个性提供了理想的客观环境。在各类人才中,纵横家人物最具有个性,最能够把个性张扬中的消极面发挥到极致。也就是说,纵横家最有条件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特别是在他们事业顶峰的时候。当然,任何时代也不能长期容忍这种形式的个性张扬,而绝大多数纵横家也为这种近乎无节制的个性张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由于后世史学家的记载和渲染,战国中后期的古代历史就成为了纵横家大显身手的时代。《孟子》引述了当时有些人的一种说法:“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司马迁在《史记·张仪列传》中也认为像苏秦和张仪这样纵横家是“真倾危之士”。这些当然都是夸张的说法,并受到孟子的严厉批评。但是,既然有这样的说法,也说明了在当时形势下,各国由于战争和存亡问题引发了强烈的不安全感,以至于很容易轻信纵横家们的说辞。像《战国策》和《史记》这样的书中记载的一些故事虽然不具有普遍性,各国的君主和大臣也不能愚蠢到任由纵横家们来摆布,但在一些条件下,特别是在许多突发事件的背景下,加之当时的专制政治制度的作祟,纵横家们确实会赢得一些表现自己权谋诡诈之术的机会,以至于不得不让一些人惊呼,这真是个纵横家纵横天下的时代。

不用说,历史地来看,不管纵横家有过怎样的辉煌,不

管有多少纵横家人物曾经多么令人恐惧和羡慕,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政治和军事实力才是根本。如果说纵横家的出现是因为秦国的崛起,那么,他们的消亡也是因为秦朝的诞生。就连极度渲染纵横家的司马迁也认识到,“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余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史记·秦本纪》)。这说的是,别看山东六国的合纵之举声势浩大,可一旦秦国正面迎战,山东诸侯们的联合就会土崩瓦解,因为他们不可能长期团结起来。这样一来,秦国人不用出兵,天下诸侯就已经处于下风了。秦国人再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合纵之约很容易就会解散,各国只能纷纷去讨秦国的欢心。当秦国准备好了之后,一举向东,山东六国根本不是对手,只能坐待灭亡了。换句话说,纵横家的主张能否有市场,关键还在于各国的形势和实力,而并不在于纵横家自己想怎么说、怎么做。合纵之所以没有成功,连横之所以取得实效,归根结底就是秦国的实力在说话。

(三) 三晋多出纵横家

战国纵横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组成纵横家的主体是三晋人物。在《史记·张仪列传》中,司马迁最后概括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这是述说三晋纵横家时人们最常引用的一句断言,不过,其中的意义是比较复杂的,甚至是比较杂乱的。根据司马迁的如此说法,所谓“权变之士”即“从衡(纵横)强秦者”。在纵横家中,只有连横才对秦国有利,而合纵则对秦国不

利,所以,“纵横强秦”的说法是不够严谨的。另外,“权变之士”的说法也不够准确。“权变”大抵指权谋、变通,根据我们的分析,以权谋和变通概括三晋纵横家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不管怎么说,就地域上来看,司马迁的论断还是比较准确的。具体说来,上文所述以施展外交策略而闻名的“战国四君子”中,有两位是三晋人士,在他们的门下,也出现过不少有名的外交家,其中不乏纵横家的滥觞。而在纵横家最得意的时代,最有成就的纵横家,如苏秦兄弟三人、张仪和公孙衍等,也都是三晋人士。

那么,三晋国家为什么会成为纵横家人物的主要产地呢?

首先,三晋国家的形势决定了对纵横家的需求。这里所说的形势,有自然方面的,也包括社会方面的。从自然形势方面看,当时的三晋国家可谓天下之枢纽,地处中原,北连燕国,南接楚国,西邻秦国,东毗齐国,所谓“四战之地”是也。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既要应对上述四国的现实威胁,还要处理三晋之间的种种矛盾,所以,三晋国家积极寻求纵横家式的急功近利的主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从社会状况来讲,三晋中的韩国相对较弱,而魏国则是战国初期的强国,赵国在战国中期有过短暂的辉煌,可是,在秦国崛起的同时,三晋国家内部深层的社会矛盾开始凸显,不仅中止了前进的步伐,而且出现了滑坡和倒退,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缺乏长远而有力的表现,这同样为纵横家发挥其才能提供了很好的机会。需求决定供给,三晋国家

对纵横家的旺盛需求,是三晋“权变之士”不断涌现的社会基础。

其次,三晋纵横家人物多数出身贫贱,在当时瞬息万变的形势下,容易使他们形成放手一搏的赌徒心理。置诸死地而后生,在最艰苦条件下投机倒把,是人类智慧的超常释放和发挥。三晋纵横家中最著名的苏秦和张仪,在他们事业的初期,都曾跌入看似毫无希望的谷底。但他们都能以超常的毅力和罕见的智慧坚持了下来,并且以一无所有的布衣之身说服诸侯。就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无所牵挂,所以,当他们面临一般人所谓的危险时,可以说是无险可冒,只能选择放手一搏。在这个时候,个人的素质得到了最佳的表现。一旦想前顾后,一旦有了拿不起放不下的东西,就无法成就纵横家式的空手套白狼的事业。总之,贫贱的出身、一无所有的状况,是三晋“权变之士”深厚的个人心理基础。

第三,三晋国家有着涌现外交家的传统。如上所述,虽然外交家与纵横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在孤注一掷、随机应变方面,在故作镇静、巧言利辞方面,此二者却有着共同之处。比如说,“战国四公子”中,赵国的平原君和魏国的信陵君,在处理国内国外的政治危机时,都有过这方面的表现。最有名的平原君的门客毛遂,曾经自荐出使楚国,以三寸舌胜百万师,促成楚、赵合纵。至于蔺相如以浩然正气直逼秦王,实现完璧归赵,更是千古传颂的英雄壮举。像他们这样的表现,在忠君报主方面虽然高于纵横家,但在与大国君主对峙时的临危不惧,在情况危急时的及时应变,在关键

时候的以身相博,却都是成功的纵横家所必备的素质,并且在三晋纵横家身上就有着精彩的表现。可以说,三晋的外交传统是三晋“权变之士”的历史基础。

所以,“三晋多权变之士”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各种必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三晋国家的特殊形势也曾产生了三晋法家和兵家等足以影响天下大势的思想和人才,但这并不会掩盖三晋纵横家的风采。事实上,真正的人才都出自衰世乱世,都出在弱国小国。因为这种情势和国情,既是对人才的召唤,也能够给人才的产生提供必需的磨砺和打击。当然,让这样的人才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通常又是强国和大国,所谓晋材秦用是也。这种历史的悖论,也足以让三晋后人扼腕叹息、掩卷深思。

二、苏秦与苏氏三兄弟

(一)拜师鬼谷,发愤读书

在三晋纵横家中,最早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当然是苏秦。

《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说:“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周洛阳,指的是战国时期周天子的所在地。在苏秦时代,东周洛阳地域很小,其地望就在今天的河南洛阳界内,当时是在韩国境内,也可以说是韩国的国中之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苏秦可以说是韩国人,所以才被司马迁归于“三晋”人士之中。

《史记》的《索隐》认为，苏秦字季子，是西周苏忿生的后人。周武王建立周朝时，苏忿生为司寇，受封苏国，苏国的都邑为温地（在今河南省温县）。苏国为己姓之人，立国者为己忿生，称“苏”忿生，是因其国名而来。苏忿生的后人以国为氏，改姓苏，这在当时也是常有的事情。在整个西周时代，由于周天子权力相对稳固，处于东都洛邑（成周）附近的苏国并未发生重大的政治事变。可是，随着东周以来周天子的失势，诸侯大国不断崛起，像苏国这样的小国日子就开始不太好过了。开始时，苏国受到郑国的打压，到晋文公称霸时，苏国就被晋国吞并，苏忿生的后人失去了传统的封国和生存之地，或者只能在周天子的朝廷做官，或者沦为平民。到战国中期苏秦在世时，就真的成为彻头彻尾的平民之家了。

苏秦有兄弟五人，苏秦排行最少。他的长兄是苏代，弟弟是苏厉、苏辟和苏鹄。苏秦之外的苏氏兄弟四人，据说都是当时的游说之士，显然是受到苏秦的影响，沾了苏秦的光，但最有成就的是苏代和苏厉。苏秦年轻时向东到了齐国，在有名的鬼谷先生门下学习。关于这位鬼谷先生，历史上说法很多。《史记》的《集解》引用徐广的说法是：“颍川阳城有鬼谷，盖是其所居，因为号。”这是说因为有鬼谷这样一个地方名，所以居住在此的这位高人就以“鬼谷”为雅号。但有一位名叫乐壹的人，他在注释《鬼谷子》这本书时称：“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就是说，鬼谷子本无其人，而是苏秦所创造的，目的是为他自己的主张找到一个过硬的根据。